

# 厦门海外交通

李全明 著



廈門文化叢書

葉飛

## 《厦门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

顾 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友义 方汉生 未力工 朱天顺 朱鸣岗 许文辛  
陈孔立 陈文藻 陈炳琳 陈碧笙 杜明聪 杨国桢  
郑炳忠 高 怀 笄林华 黄守忠 商英伟 彭一万  
谢澄光 蔡望怀 潘懋元

主 编：李永裕

副主编：陈照寰 李熙泰 洪卜仁

秘书长：李熙泰 黄学惠（副）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松荣 甘于黎 江林宣 李永裕 李熙泰 陈 耕  
陈照寰 林仁川 林美治 姚景良 洪卜仁 郭瑞明  
徐常波 徐 学 黄鸣奋 黄学惠 谭南周 裴慎勤  
戴光华

## 总 序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感情乳胶。

厦门背倚漳泉内陆，面对台湾南洋。以厦门为交会点的这两个扇面里分布着三四千万操闽南话的炎黄子孙。他们的祖先多半是来自中原的南迁移民，承袭了古老的优秀的华夏文化传统。他们甚至还保留着某些在中原早已消失了的文化因素。由这种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共同的文化，从而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思想感情所产生的亲和力、凝聚力是坚韧的、无形的，因而也是隔不断、打不烂的。

厦门据台湾海峡之津要，为祖国东南之良港，历来是台胞、侨胞、港澳同胞进出大陆之口岸，是祖国与世界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门户。它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开放：一次是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这是被动的；一次是10多年前才开始的经济特区建设，这是主动的。但无论如何，它是中西文化的一个会合点。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中西文化在这里互相冲击、碰撞、融会，并将其冲击波在这两个扇面里辐射开去。

可以说，厦门文化就是建立在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有益的营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闽南、台湾、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文化状况的，有着自己地区特色的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坚毅朴实，富有开拓进取精神，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厦门人民。而他们又不断丰富、推进着厦门文化，使其作为华夏文化的一支而熠熠生辉。

10多年来，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以及海峡形势的缓和，海外赤子寻根问祖，从文化传统上进行认同者与日俱增。当前对这独具特色的文化给予加倍的关注，广收博采，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鉴别、探讨、研究，使其上升到某些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指导我们的实践，无疑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需要，是提高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需要，是教育海内外青年一代爱乡、爱国、热爱民族文化传统的需要。

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发展地区文化、民族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自豪感能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为厦门文化的研究，开辟更为宽广的前景。

本丛书计划编为两辑，每辑12本。第一辑蒙厦门市人民政府拨款资助出版。第二辑蒙厦门协兴发展公司、厦门傲能电子公司、厦门筓笪新区建设开发公司乐捐资助出版。本丛书编纂出版得到蔡望怀同志的一贯支持与关照，借此一并致以深挚的谢忱。

《厦门文化丛书》编委会

1992年12月1日

1996年6月修订

## 序

海上交通是海洋沿岸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主要途径。以海上交通为依托的海洋经济活动——特别是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带有开放性的特征，给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变迁予深远的影响。厦门文化的区域特色是和海洋社会经济的演变密不可分的。

厦门和附近岛屿是闽南沿海交通往来和渔民栖居渐次得到开发的。明季日本和西方海洋势力的刺激，逐渐形成中国沿海走私的中心。隆庆（初年）部分开放海禁，厦门是全国唯一的出海贸易港——月港的入海口，东西洋贸易的始发点。闽南漳、泉地区海洋经济的兴起，哺育并提升了厦门的地位。明清之际，郑成功父子的经营，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出现海洋社会的雏形。虽然这一发展趋势，后来由于国际国内环境条件的变更，受到摧残和顿挫，但在鸦片战争前，厦门从行政区域上看，只是同安县的辖地，而从经济实力上看，却是福建的经济中心。这种奇特的社会经济人文景观，致使有人把它形容为当时的“经济特区”。

鸦片战争后的开埠，厦门是西方列强划定的近代中国的出海口，传统中国海洋经济的“特区”嬗变为西方资本主义海洋经济侵入的殖民地“特区”。在中西文化撞碰、社会结构解体和重组的过程中，海外交通伴随着厦门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充满矛盾和痛苦。这一畸形的工商社会，造就近代厦门文化的驳杂多元，海洋传统在

扭曲中延续和张扬。

厦门的重新崛起，是在本世纪80年代初。10余年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在在说明海洋经济是厦门的生命线，是厦门新文化的活源泉。

于是，了解厦门海外交通所展示的海洋社会经济史，也就成了了解厦门文化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厦门海外交通所蕴藏的社会经济内涵，也是厦门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李金明君的这本书，以海外交通为经，海外贸易、海外移民为纬，生动地勾勒出厦门海洋经济活动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为深入了解厦门文化背景和内涵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值得渴望认识厦门的人们一读。作者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博士，长年从事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具有雄厚的学术功底，佳作叠出。他充分利用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外文资料，加以系统的整理爬梳，深入浅出地进行整合，生动流畅地叙说端详，让读者从中自去领会它的文化底蕴，这是本书的优点和特色。对于有兴趣深入研究厦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学者来说，它又是一个出色的向导。

从海洋的视角看厦门，当然不能忘了对渡台湾海峡和通向南北洋的帆影。唯有如此，才能窥得海上厦门的全景，提升厦门对海洋的体认，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让跨越21世纪的厦门人作新的思考，新的探索。

杨国桢

1995年12月27日

鹭江随月室灯下

# 目 录

第一章	明代厦门海外交通的初步发展.....	( 1 )
第一节	厦门的地理位置和优越条件.....	( 1 )
第二节	抗倭前哨与走私活动中心.....	( 2 )
第三节	葡萄牙、荷兰殖民者的骚扰.....	( 5 )
第四节	漳州月港部分开禁后厦门的地位.....	( 10 )
第五节	厦门文化对菲律宾的影响.....	( 16 )
第六节	由厦门出口的丝绸、瓷器.....	( 21 )
第二章	清代前期厦门海外交通的迅速发展.....	( 29 )
第一节	郑成功的抗清与海外贸易.....	( 29 )
第二节	厦门海关与厦门洋行.....	( 38 )
第三节	厦门与日本的海上贸易.....	( 46 )
第四节	厦门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	( 50 )
第五节	英商在厦门的贸易.....	( 65 )
第三章	五口通商后厦门的海外交通.....	( 71 )
第一节	早期英国领事在厦门的活动.....	( 71 )
第二节	洋行与洋关的设立.....	( 75 )
第三节	对外贸易的发展.....	( 79 )
第四节	茶叶贸易的衰落.....	( 85 )
第五节	华工、华侨出洋中心.....	( 89 )
第四章	甲午战争后厦门的海外交通.....	( 102 )

第一节	日商介入厦门航运业的竞争.....	( 102 )
第二节	华资经营的厦门航运业.....	( 105 )
第三节	辛亥革命前后厦门的对外贸易.....	( 110 )
第五章	抗战时期厦门海外交通的衰落.....	( 117 )
第一节	日本对厦门航运业的垄断.....	( 117 )
第二节	厦门沦陷后的对外贸易.....	( 120 )
第三节	战后厦门航运业的短暂复苏.....	( 124 )
第六章	新中国建立后厦门海外交通走向新历程.....	( 129 )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海外交通发展缓慢.....	( 129 )
第二节	70年代海外交通发展的大转折.....	( 131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中海外交通的迅猛发展.....	( 134 )
编后	.....	( 139 )

# 第一章 明代厦门海外交通的初步发展

## 第一节 厦门的地理位置和优越条件

厦门位于北纬 $24^{\circ}26'$ ，东经 $118^{\circ}04'$ ，地处福建省东南部，九龙江出海口，隔台湾海峡与台湾之台南、澎湖相望，由厦门岛、鼓浪屿和内陆九龙江北岸的沿海部分与同安县组成。

厦门岛东西长约11.5公里，南北长约13.5公里，面积128.14平方公里，东联金门、烈屿，西接宝珠、高浦，南当太武，北横丙洲。西南界海澄、龙溪，东南出大担、小担，直通澎湖，西北有美人、天马，东南拥鸿渐、香山，为华南海滨之要地。清人庄光前曾从海防的角度论及这些岛屿，认为厦门的宝珠屿、鼓浪屿、离浦屿、薛浦屿和金门的大嶝屿、小嶝屿、夹屿、白屿，前后倚伏，左右犄角，为易于匿藏之所；其他如高浦、马銮、高崎、浔尾、五通、澳头、刘五店等处，为渡口之要道。沿流向东是大担、小担二屿，大担以外是浯屿，“据海疆扼要，北连二浙，南按百粤，东望澎湖、台湾，外通九夷八蛮，风潮之所出入，商舶之所往来，非重兵以镇之不可。”

厦门在宋代称为“嘉禾屿”，又称“嘉禾里”，属泉州府同安县。元代立千户所，明时为中左所，隶福建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年（1387），为防御倭寇入患，江夏侯周德兴于此筑城，约7年方成，号“厦门城”。清顺治七年（1650），郑成功以厦门为基地，起兵抗清，于1655年将厦门改称“思明州”。康熙年间，清政府收复厦门、金门

《鹭江志·总论》，引自周凯：《厦门志》卷二，沿革。

庄光前：《同邑海防论》，载《厦门志》卷九，艺文略一。

后，又恢复原来的名字——厦门。

厦门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港口，有内港与外港之分，外港在鼓浪屿与大陆之间，内港在鼓浪屿与厦门岛之间。外港面积约3.63平方公里，长2.78公里，宽1.66公里至0.6公里不等，水最深处达34米，最浅处不足1米，港埠所在地的一般水深为9米；内港面积1.28平方公里，水深自25米至7米不等，港埠附近平均为9米至12米。其港内主航道水深超过12米，许多地方深达25—30米，最深达40多米，不淤积，港域宽，海岸线长达234公里，且港内风力不大，一般为2—4级，7—9月份虽有台风影响，但因港湾深入陆地，故避风条件甚好。18世纪初期一位名叫霍尔德（P.D. Halde）的法国人曾称赞厦门港为“世界上最好的港口之一”，说它“可容纳数千艘船舶，且为一深水良港，最大的船舶亦可直抵岸边，相当安全地停泊在那里”。另外，厦门居于香港与上海航线的中心（距香港287哩、距上海560哩），与台湾、澎湖仅隔一条台湾海峡（距高雄156哩、澎湖102哩）；它毗邻漳州、泉州两市，远通日本（距长崎816哩）、菲律宾（距马尼拉677哩）及南洋群岛，在发展海外交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 第二节 抗倭前哨与走私活动中心

倭寇，顾名思义就是日本的海盗。它主要由日本的武士、浪人以及奸商等组成，自元初至明一代，不断对我国沿海进行骚扰、掠夺，前后持续长达300余年。

霍尔德（P.D. Halde）：《中国通史》第一册，1741年，伦敦，第169页。

自14世纪以来，日本正值南北纷争时期，继镰仓幕府之后建立起来的室町幕府仍不能控制分裂局面，一些在封建兼并战争中因失败而失掉军职的武士转而成为“浪人”，专靠抢劫和其他非法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和那些因受幕府和藩侯的压迫和限制，从而潜伏于日本沿海从事走私活动的奸商结合起来，在亚洲大陆沿海地方进行掠夺，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倭寇”。明王朝建立之初，这些倭寇与盘踞在海岛的张士诚、方国珍余党勾结起来，出没于我国沿海一带，“焚民居，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为防止倭寇骚扰，明政府在沿海一带设立内外卫，凡卫所军士大率以5600名为一卫，1120名为一千户所，112名为一百户所，每100户内总旗2名，小旗10名。洪武元年（1368），泉州置卫指挥使司，领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隶福建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泉、漳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沿海卫所戍兵，以防倭寇。周德兴到福建后，即在水澳建城，置永宁卫，领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在小兜建城，为崇武所；在厦门建城，为中左所；在福全建城，为福全所；在金门建城，为金门所；在高浦建城，为高浦所，别为守御千户所。移永宁卫中左所官军到厦门，筑城守御，遂为中左千户所。此外，周德兴还在福州的烽火门（在福宁州宁德县地方，与浙江之温、台接壤）、兴化的南日（在福清县镇东卫兴化府地方）、泉州的浯屿（在泉州府永宁卫同安县地方）设立三个水寨。这三个水寨连同景泰年间（1450—1456）增设的漳州铜山水寨（在漳州府漳浦县镇海卫及玄钟地方）、福州小埕水寨（在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地方），合称为“五澳”。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乱。

罗青霄：《（万历）漳州府志》卷七，漳州府·兵防志·军兵。

《厦门志》卷三，兵制考。

《（万历）漳州府志》卷七，漳州府·兵防志·水寨。

浯屿在厦门南大海中，水道四通八达，为海澄、同安二邑的门户。该屿周围6里，左达金门，右临岐尾，极为要害。洪武间周德兴把浯屿水寨设在大担太武山外，可以控制漳泉二府，且在海洋之要冲，有险可据，倭寇不敢轻易靠近。但到成化年间（1465—1487），有人认为浯屿水寨“孤岛无援”，把水寨移入内港数十里，在中左所地方，与高浦所仅一潮之隔。于是，月港与松屿再也没有什么门关之限，倭寇随时可以进出，无人阻拦，而原来的浯屿水寨（后称旧浯屿，或外浯屿）则成为海寇聚集的走私活动中心。每逢三、四月东南风汛时，外国走私船只多自粤趋闽，抛泊于旧浯屿；而本地的走私商人亦常于旧浯屿泊船，月港出货，并不时游弋于安海、崇武等处。

嘉靖三十七年（1558），洪迪珍盘踞旧浯屿为巢穴，招引日本走私商人到此贸易。洪迪珍，福建漳州人，俗称洪老，嘉靖二十四年（1545）曾引日本富商到南澳进行走私贸易，自此之后每年到日本贸易一次，遂成巨富。据说他在日本贸易时，凡遇有中国人被倭寇掳掠，则以货物赎之，遣送回国，因此沿海之人颇颂扬之。当他盘踞旧浯屿时，周围民众往返接济，络绎不绝，官府无法阻止，设八桨船追捕，又无所获，只捕些无辜商船解官，于是迪珍开始蔑视官府，而官府又拘其家属，致使迪珍无反顾之期，遂与倭寇表里为乱。据说当时被他招引来浯屿贸易的日本商人就达3000余人，走私船只纷纷泊于浯屿，官府无之奈何，旧浯屿遂成为闻名中外的走私活动中心。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

谢杰：《虔台倭纂》下卷，倭议二。

陈鏊：《（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十四，丛谈志·遗事。

《（万历）漳州府志》卷十二，漳州府·杂志·兵乱。

### 第三节 葡萄牙、荷兰殖民者的骚扰

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占据马六甲后，则迫不及待地想打开对华贸易的大门，以垄断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从中攫取巨利。1514年，当第一艘葡船从马六甲到中国进行贸易时，他们发现，1公担胡椒在马六甲仅值4达卡（Ducat，中世纪在欧洲各国流通的银币名），而在中国却可卖到15达卡，赢利近4倍。于是，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把香料运往中国和运往葡萄牙同样可获得巨利”。1517年，他们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派遣舰队司令佩雷斯·安德雷德（Peres de Andrade）和使者皮来资（Tome Pires）到广州，正式要求准许他们到华贸易；1518年，马六甲总督又派遣西蒙·安德雷德（Simao de Andrade）来代替其兄佩雷斯。这位后来的舰队司令以当时葡萄牙殖民者对待其他亚洲人的办法来对待中国人，未经许可就在屯门筑起一座碉堡，在那里伺机抢劫和勒索进出口中国海港的船舶的钱财。对于葡萄牙殖民者这种强盗行径，明朝政府当然不准许他们在广州进行贸易。

1522年，葡萄牙殖民者被海道副使汪鋐驱逐出广州后，即在福建和浙江沿海的偏僻小岛上寻找居留地，开始从事走私贸易，其中最主要的居留地是宁波附近的双屿和厦门南边的浯屿、月港。嘉靖二十六年（1547），葡萄牙船只载运货物到浯屿从事走私贸易，浯屿指挥丁桐和去任海道副使姚翔凤受金黥货，纵之入境，漳泉商

张天泽（T.T.Chang）：《中葡通商研究》，1933年，莱登，第62页。  
见《韦尔斯利侯爵继承人献给大英博物馆的驻华使馆报告》，引自《中葡通商研究》，第65页。

博克瑟（C.R.Boxer）：《16世纪的华南》，1953年，伦敦，第22页。

人辄潜往浯屿与之贸易。巡海道柯乔、漳州知府卢璧、龙溪知县林松发兵攻打葡萄牙船，不克，走私贸易更加猖獗，当地居民如长屿喇哒林恭等，为之前后勾引，大担屿民姚光瑞等110余人，为之往来接济。面对这种情况，巡视浙福都御史朱纨为断绝葡萄牙的走私贸易，再次发兵攻打之，擒获葡萄牙首领3人，并通贩者90余人，命令柯乔及都司卢镗就地斩之，葡萄牙船始从浯屿撤走。

有关这次交战，葡萄牙人平托（Fernaõ Mendes Pinto）在其著作《东洋纪行》（Peregrinacao）中亦有记载，他写道：葡人在漳州之浯屿建有房屋，大约葡人自被逐出宁波后，即勾结中国奸商，贿赂中国地方官吏，来漳州经营其第二居留区，以作为贸易的根据地。他们推举葡人苏舍（Ayrex Botelho de Sousa）为漳州总督，管理一切行政事务，当时有一阿美尼亚人，居漳州六七月而病故，苏舍乃将其遗产查封，代为保管。后来得悉有两名中国商人欠此阿美尼亚商人各种货款达3000金，无力偿还，即拘押其人，将其全部商品作为阿美尼亚商人的遗产而没收之。这两名中国商人不服，诉于官，中国官吏则下令禁止与葡萄牙人交易，违者处以极刑。于是葡萄牙人处境非常困难，粮食来源被切断，只好袭击附近村庄，从而引起骚乱，当地民众极其愤怒，群起而攻之。事情发生后16日，中国政府即派大小船只120艘，满载士兵，前往围剿，泊于漳州港内的葡船13艘全被焚烧，500多葡人中，幸免者仅30人，当时是1549年，即明嘉靖二十八年。

把来犯的侵略者驱逐出境，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朱纨却将俘获的本地走私商人也一并斩首，搞得那些参与走私贸易的贵家势豪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则勾结在朝的同乡官员，弹劾朱纨“擅其刑戮，请治其罪”。上命兵科给事中杜汝楨前往调查

此事，杜汝祯调查后上奏：来犯者为满刺加的葡萄牙人，每年私自招引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鬻番货，未尝有侵犯流劫之事。嘉靖二十七年再到漳州月港、浯屿等处，当其入港时，各地方官既无拘其人货，也无上奏朝廷，反而接受其贿赂，纵容其停泊，使内地奸徒交通无忌，至事情败露后，始追捕围剿，以致葡萄牙人拒捕被杀，而后捕获的一些人又不分是外国人或本地人，是首犯或胁从，一概擅自行诛，使无辜并为鱼肉。 朝廷根据此调查，下令逮捕朱纨至京讯鞫，朱纨饮药自杀。从此朝廷罢巡视大臣而不设，海禁随即大弛，走私贸易更形猖獗，中外皆摇手不敢言海禁事。

继葡萄牙殖民者之后来犯厦门的是荷兰殖民者。17世纪初期，欧洲各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迅速增长，其中尤以生丝为最重要。1603年2月25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长希姆斯柯克（Jacob van Heemskerck）在柔佛港外劫掠了一艘1500吨的“圣·凯瑟琳娜”（Santa Catharina）号葡萄牙船，其装载的船货中有中国生丝1200大捆，在荷兰值225万多荷盾。8月，当船长在阿姆斯特丹公开售卖这些船货时，正值意大利丝歉收，船货很快就被抢光，整个欧洲的买主汇集到这里，自此之后，阿姆斯特丹开始被列入最重要的丝市之一。 同年7月底，另一船队司令麻韦郎（Wijbrand van Waerwijck）所率领的船队在澳门岛前劫掠了一艘开往日本的葡萄牙船，在其船货中有生丝2800大捆，在阿姆斯特丹售卖每捆500荷盾，共得款140万荷盾。 这两次售卖大大刺激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胃口，他们迫切想打开同中国的贸易，以取得赢利高昂的生丝等中国商品。

翌年（1604），麻韦郎决定亲自到中国作贸易尝试。他于6月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三，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壬子。

格拉曼（Kristof Glamann）：《荷亚贸易》，1958年，哥本哈根，第112—113页。

《中葡通商研究》，第113页。

27日从北大年开航，7月中旬到达广州附近沿海，原拟航行到澳门，却被风吹离航线，于8月7日到达澎湖岛，在那里同福建省官员开始谈判贸易，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1622年，窃踞在巴达维亚的荷印总督燕·彼得逊·昆（Jan Pieterszoon Coen）命令雷耶斯佐恩（Kornelis Rayerszoon）率领15艘船和800名士兵进攻澳门，企图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他指示说：“为了取得对华贸易，我们有必要借上帝的帮助占据澳门，或者在最合适的地方，如广州或漳州建立一个堡垒，在那里保持一个驻地，以便在中国沿海不断地保存一支充足的船队。”他以为这样就可迫使明朝政府同意他们进行直接贸易，但没有想到雷耶斯佐恩被打败了，士兵损失1/3，包括船长亦被击毙。进攻澳门失败后，他们即占据了澎湖岛，在那里筑起堡垒，据燕·彼得逊·昆认为，澎湖是一个最好的战略观察点，如果中国人不愿意同荷兰贸易，那么雷耶斯佐恩则可在这新取得的基地进攻所有的中国船只，尽可能紧密地封锁中国沿海，把俘获的水手送到巴达维亚作为爪哇和班达的劳力使用。他自信这种无限制使用恐怖手段的做法，将迫使中国人屈服，他热诚地颂扬埃尔金伯爵（Lord Elgin）的名言：“对中国人无理可讲，唯有诉诸武力。”

荷兰殖民者自1622年6月占据澎湖后，则不时对我沿海一带进行骚扰，突驾五舟进犯漳浦附近的六敖，被击败后，又放舟外洋，抛泊于旧浯屿。随即进攻厦门，盘踞内港，无日不搏战，又登岸攻鼓浪屿，烧洋商黄金房屋、船只，不久又进泊圭屿，直窥海澄，被海澄知县刘斯 击退之。天启三年（1623），再次进攻厦门，入曾家澳，犯鼓浪屿，为浯铜游把总王梦熊所击败。此后仍盘踞在澎湖岛，“乘汛

埃尔德利奇（F.B.Eldridge）：《东方海上霸权的背景》，1948年，伦敦，第257页。

博克瑟（C.R.Boxer）：《葡萄牙绅士在远东》，1948年，伦敦，第77页。